

美国研究丛书之一

美国的公司化

——渡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美〕 艾伦·特拉登堡 著

(中译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美国研究丛书之一

美国的公司化

——镀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中译本~~

~~〔美〕~~ 托伦·特拉登堡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年·北京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 1982 by Alan Trachtenberg

美国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潘绍中

本书翻译：邵 重、金 莉

美国的公司化
——镀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中译本〕
〔美〕艾伦·特拉登堡 著
邵重、金莉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8.375印张 字数：175(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2.65元

ISBN 7-5001-0094-9/F·26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艾伦·特拉登堡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美国研究系主任，当代著名“美国研究”学者。1984年10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派遣了第一个“美国研究”学者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座谈和讲学，特拉登堡教授即为代表团成员。该团的访华报告《中国的美国研究》于1985年底由美国科学院出版社发表。

本书是作者80年代的代表作。作者抓住“镀金时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采取宏观着眼、具体着墨的手法，从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到工业化带来的文化震荡，从社会的两极分化到价值观的明显分野，从现代化大城市的崛起到美国思想观念的演变，勾画了现代美国文化与社会诞生的生动画面。对于我国读者深入了解当代美国的特点及其历史渊源、反思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困难和希望，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借鉴。

本书为我公司出版的“美国研究丛书”之一，以原文注释本和中译本两种形式分别出版，既为对“美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也为愿意阅读英文原著的读者提供了一本内容充实的英语读物，同时阅读原文注释本和中译本可起到“对照读物”的作用。

为便利我国读者，我们在无损于原书内容和学术风格的

前提下，经作者同意，做了一些删节。我们感谢作者和希尔·王出版公司同意我们在中国出版这本名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年10月

借鉴、反思、奋起

——《美国研究丛书》前言

—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化，我国读者对各国历史、文化、社会的演变发生了浓郁的兴趣，希望通过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更好地借鉴外国的长处，促进对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国情、民情的反思，为建设我国的两个文明提供有益的启示。其中，美国作为最年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美国研究”也就不胫而走、颇为流行了。

但是，什么是“美国研究”？对此，不可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广义上说，“美国研究”可以包括整个人文学、社会科学，以至其他学科领域，只要其内容与美国有关即可，也就是说，大体上相当于“关于美国的研究”。然而，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还有一种狭义的、专业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美国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不同，它已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学术范畴，一种“以美国文化为对象的”、“多学科的综合方式”。更具体地说，它“指的是从传统学科中吸取人员来对美国经历的

专题或阶段进行合作探讨的多学科研究。这种治学方式在其成熟过程中曾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极大影响，其重点原来在于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后来，对价值观念的强调受到了挑战，人们重新对社会史发生了兴趣并就美国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种种问题。但是，不管其强调的角度有何变化，美国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观点；它坚持认为：一个行动或一篇文章的意义，不可能仅仅采用单学科的研究手段来完全弄清，而必须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行动和文章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注〕从这种概念出发，“美国研究”有其确定的内涵而不能等同于任何关于美国的研究；同时，它由于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也不仅限于一个专题，因而又不宜称之为“美国学”。无论如何，这样一种跨越传统学科界限、博采各科之长来对美国文化的整体或其分支进行综合研究的治学方式，显然有其独到之处。了解它，不仅可以真正懂得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研究”的含义、恰当地引进其成果，而且能够在浩瀚、纷繁的关于美国的种种具体研究中，抓住美国文化的精髓，比较透彻地理解美国的国情，加深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亦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比较、有所吸收、有所扬弃，真正起到借鉴和反思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奋起。这正是我们编选这套“美国研究”丛书的根本宗旨。

二

那么，“美国研究”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呢？

原来，直到本世纪初叶，立国已逾百年并在经济发展上跃居世界首位的美国，在学术上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英

国。即以文学为例，尽管爱伦·坡、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早已蜚声世界文坛，美国文学即使在本国大学的英文系里也还是英国文学的“分支”而无自己的独立地位。占据统治地位的“纯文学”（*belle-lettristic*）和“历史语文学”（*philological*）治学方式，或从古典美学的抽象艺术标准，或从语言学的渊源、异同，贬低美国文学的独特性，把它归结为英国文学的衍繁，甚至将真正具有美国风貌的佳品打成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俚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国力和影响有了急剧的增长，现代科学认识论的发展又使人们不再满足于孤立地、静止地鉴赏作品而要求把文学与其历史、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研究，进而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直到这时，美国文学才开始得到了美国人自己的认可；美国的“现代语文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单独建立了“美国文学小组”，美国文学在一些美国大学里初次作为独立课程讲授。又过了十来年，随着第一个《美国文学》专业杂志的出现（1929），美国文学总算在各大学的英文系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是，无论作为文学还是作为学科，它在全世界赢得普遍的承认，仍要等到美国文学呈现了极大繁荣之后，也就是美国立国一百七、八十年后的本世纪中叶了。

美国文学的独立，激发了对美国事物的普遍兴趣；而历史学的发展，又从另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由于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美国史从来都是独立的一门课程。然而，究其实质，也不过是欧洲史的分支和延伸而

已，所遵循的仍是重于叙述、就事论事、以政治事件为主的传统治学方式。然而，勃兴于19、20 世纪之交的“新历史学”广泛采用了社会科学中涌现的新方法、新材料，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实质，开拓了美国史学的新阶段。其中，首先脱颖而出的是 F.J. 特纳及其创立的“边疆学派”。尽管他的学说和论证在学术上问题颇多、在政治上美化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但是他重视美国历史发展的固有因素，把它看成是美国条件下美国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无疑对美国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并为“美国研究”的诞生作了舆论准备和学术探讨。此后兴起的，以 C.A. 比尔德为首的“经济学派”，则吸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方法，揭示传统美国史学奉如神明的人物和事件莫不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从而提出了分析美国发展的重要线索。以 J.H. 鲁滨逊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更进一步从物质利益的发展来分析社会思想和信仰的演变，揭示这些思想和信仰如何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在通常默默无闻的大众中传播并发生作用。这样就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了美国思想史的研究，为“美国研究”提供了串联其来源纷繁的材料以说明文化及价值观念发展的合适手段。正是由于“美国研究”和历史学的这种“不解之缘”，它在美国大学的第一个雏形就是耶鲁大学于1933年建立的跨学科的“历史、艺术和文学系”。而美国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及其各种分支（诸如宗教史、劳工史、婚姻与家庭发展史），至今都为“美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至于我们在第一节中曾引述的看法：“美国研究……在其成熟过程中曾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极大影响”，这主要是指

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式。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发展较晚的学科。19世纪下半叶，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推动下，首先产生了研究人类进化、变异和分类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其后才逐渐形成了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在英语里，作为人类学概念的“文化”（culture）一词是由英国人E.B. 泰勒在其专著《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更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20、30年代，F. 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R. 本尼迪克特，M. 米德等）在系统研究印第安和其他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文化人类学的一系列概念、原则和方法。尽管文化人类学家至今对于“文化”的具体定义莫衷一是，并且往往趋向于忽略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他们提出要对人类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的基本看法，为“美国研究”纷繁迥异的方法和材料提供了一个焦点；而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进行研究的多学科方式，也为“美国研究”学者们所广泛采用。

当然，“美国研究”毕竟不是文化人类学。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渊源单一、相对孤立、比较稳定的原始文化，而是一种异常混杂、变化剧烈、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基本上跳过了前资本主义阶段！）。要从整体上研究它，不仅要了解它的种种渊源和发展脉络，更要找出它错综复杂、蕴含深刻的独特之处，以及造成这些特征的条件、背景和局限。

这里涉及学术研究中如何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美国研究”之所以应运而生并发展成熟，固然反映了

科学发展的共同趋向（由分析到综合，等等）并受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的制约，主要的还是因为人们不满足于共性的概括而去发掘、强调美国文化在美国条件下形成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尽管有其偏颇、片面之处，还是提出了有价值的新材料、新观点、新体系，对增进人们对美国文化的认识、丰富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充分估计美国文化的复杂性，对于“美国研究”的成果（包括收进本丛书的作品）采取分析、鉴别的态度。例如，作为一个总体，美国文化长期处于蓬勃发展的形势，确实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用成份而享有“熔炉”的美称，这是它富有活力和信心的表现。但是，对于真正和它的体系对立的東西，美国文化又表现了毫不含糊的排他性，诸如与私有制格格不入的印第安文化、妨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奴隶制、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忽视了任何特定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有机联系，就必然不能真正把握它的全貌与内涵，也无从在根本上进行分析和对比。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借鉴与反思时所不可不察的。

三

应该指出，“美国研究”的产生与发展，并不仅仅在于学术界的倡导与推动，而是牢牢地扎根于美国人民自身的强烈需求，得力于美国国力的增长。

作为一个历史较短、渊源纷杂的民族，美国人长期以来深深地感到缺乏一个统一的文化依托，具有一种格外强烈的

“自省”和“寻根”的要求，尤其表现于民族反思的社会动荡时期，例如独立战争前后、南北战争前后、“大萧条”时期和本世纪60、70年代。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应该说，这种“反省”和“寻根”思想是任何一个自强的民族所必需的：贫弱时需要，富强时也不可缺；新近民族固然深有此感，悠久文化更需不断反思——否则，缺乏“自省”精神，则无从更新；而没有“寻根”思想，又难免忘本。在这方面，“美国研究”可以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从“美国研究”在30年代勃兴以来，它的发展与普及受到了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和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推动，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47年，已有60余所大学开设了“美国研究”专业；1948年，创办了《美国季刊》；1950年前后出版的多卷本《美国文学史》是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1951年建立了“美国研究学会”。与此同时，“美国研究”走向国外：1947年于奥地利创办了以“美国研究”为宗旨的“萨尔茨堡讨论会”；1950年，东京大学开设“美国研究”系。此后，陆续成立了“欧洲美国研究理事会”和英、法、加等许多国家的“美国研究学会”。

在此基础上，60、70年代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更进一步促使“美国研究”走向深入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对美国传统观念的进一步反思。在激烈矛盾的冲击下，所谓的“美国梦想”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以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基督教新教和男性为中心的“正统”文化观念开始被打破，传统的社会、历史、经济等方面的信条和价值观念遭到了怀疑和挑战。这一方面反映在许多过去遭到忽视的题材得

到了新的重视和研究，如“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问题、黑人文化、“拉丁美洲后裔文化”、“妇女研究”、移民问题、劳工运动，等等。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运用新的方法（如对下层民众进行采访实录的“口头史学”）和观点（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美国经历”，特别在“民俗文化”、“大众文化”、“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等方面。尽管“美国研究”的这一新高潮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社会、时代的烙印（例如对“性解放”和吸毒问题的某种执着和宽容），总的来看，它丰富了“美国研究”的内容，加强了它的社会批判色彩，使“美国研究”走上了题材多样、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四

从上面关于“美国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与发展的简短叙述，可以看出：即使象美国这样一个历史较短的民族，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文化，也需要经过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和长时间的探索，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做得十分充分。那么，作为国情迥然不同的中国人，要比较深入地了解美国，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借鉴和反思，自然更非下一番功夫不可了。在这方面，“美国研究”的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由于强调利用多学科的治学方式、注意探讨美国文化整体上的本质与特点，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用的启示。考虑到中国读者的实际需要，我们编选的这套“美国研究”丛书，首先着重介绍美国学者关于美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脉络的著作，以求对此有个概括而全面的了解，进而兼及政治、经

济、文学、外交等重要领域。自然，丛书选入的每一本书的观点都是作者自己得自学术研究的结论，不可能、也不必要符合丛书主编或出版者的看法。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作者进行了严肃的探索，提供了基本的、富有启发的材料和分析，广大读者是一定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并从中得到宝贵的收获的。

本丛书以原文注释本和中译本两种形式分别出版，可供读者选择。中译本主要供对“美国研究”感到兴趣的广大公众阅读，原文注释本的对象则是愿意阅读英文原著的读者，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套内容充实的英语读物（对于不少读者，同时阅读中译本还可起到“对照阅读”的作用），更可以作为研究美国、学习有关课程的参考书和教科书。因此，对于书中遇到的比较难查的背景情况和其他疑难问题，注释者都提供了注释。

五

摆在读者面前的《美国的公司化》一书，正是一本具有“美国研究”鲜明特点的代表作。它所分析的，恰是奠定现代美国的雏形、告别悠久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剧烈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南北战争结束后的30至40年。作者脱出了编年叙述的窠臼，采取了宏观着眼、具体着墨的手法，从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到工业化带来的文化震荡、从社会的阶级分化到价值观的明显分野、从政治对文化的渗透到美国人思想观念的急剧演变，尤其是他对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及其一系列体制的出现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

的“白城”（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的实质的阐述，勾画了一幅关于现代美国崛起的波澜壮阔而又缕析入微的图画。一如“美国研究”元老亨利·史密斯所说，“本书实现了常常被称为‘美国研究’的宗旨却很少得以实现的理想：它对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文化进行了真正‘多学科的’阐述”。

“特拉登堡先生对经济、政治、社会和艺术活动强调得恰如其分，从而对过去常被叙述但一直条理不清的事件，展示了其相互联系及其与历史总体发展的关系，并揭示了其中的新的意义。”因此，本书于1982年出版后立刻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并成为美国研究学会1983年年会的议论中心。

史密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正象我们在前面第二节中试图说明的，乃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总的来说，特拉登堡教授在本书中也是把它作为特定条件下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剖解的，其中包括了价值观、观念形态、行为模式、现实观等等（虽然在讨论“文化的政治色彩”的第五章中，作者还分析了把它理解为文化修养、正规教育、美学感受之类的狭义的传统看法）。本书的副题，《镀金时代的文化与社会》，正是着眼于此。

然而，要阐明一个时期的“文化”和“社会”，自然一点也离不开该时期的根本特征。本书的正题，《美国的公司化》，恰恰点出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实质与形式。

众所周知，美国立国时是一个以中小农场主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它的工业化虽然在19世纪20、30年代开始起步并于40、50年代有所加速，但真正的“起飞”还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而到19世纪末它已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

强国。这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蓬勃的经济发展和艰难的经济危机频繁交替，中小企业的倒闭（甚至超过90%）和失业、罢工、暴力此起彼伏，“强盗富豪”的骄奢淫逸和广大人民的日益贫穷（50%的人口没有固定财产，40%的工人生活于贫穷线下，而1%的人拥有国民财富的50%）……贯穿这样的大发展、大动荡的，就是美国的“公司化”，即以资本主义的典型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而实现的资本的迅速积累和集中。过去，举办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要作为一种特权由政府以特许状的形式授给某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企业；到19世纪50年代还仅仅只是在铁路等行业中最为常见。但是由于这种形式有利于用少量资本控制大量游资、有利于减少投资风险、扩大资本规模和经营范围、以至于在某一行业和地区实现垄断，股份公司在南北战争后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到了70、80年代已成为最普遍的企业形式，并大大地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兼并浪潮。“公司化”的过程对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促成了现代美国文化与社会的诞生——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不过，“特拉登堡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位作家。阅读他的这本书是件十分愉快的事，而不是不得不完成的苦差使”（史密斯语）。他没有堆砌枯燥的经济统计数字，也不进行玄奥抽象的政治推理，而是通过美国文化在“公司化”的冲击下的种种具体变迁，生动地描绘了现代资本主义典型文明的兴起和代价，从而对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己的两个文明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和启示。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本书奉献给中国读者。对于特拉登堡教授和

希尔·王出版公司同意我们在中国出版这本名著，尤其是特拉登堡教授还为本书的中国读者撰写了新的序言，我们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潘 绍 中

1989年于外交学院

【注】：1984年10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派遣“美国研究”学者代表团访华，此处引文见该团访华报告《中国的美国研究》，第16、17页。